

为贯彻落实毛泽东同志《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精神,号召文艺工作者深入基层、扎根群众、体验生活,创作出大量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1944年,正值“七七事变”爆发七周年,晋绥边区晋西文化界抗日救国联合会和中华全国文艺界抗敌协会晋西分会联合举办“‘七七七七’文艺奖金评选”活动,极大激发了边区文艺工作者的创作积极性,晋绥边区掀起了抗战文艺创作热潮。

“七七七”文艺奖缘起及评选办法

晋绥边区举办“‘七七七’文艺奖金评选”活动,基于三条原因:一是为了响应毛泽东提出的“文艺要为最广大的人民大众服务”的号召,动员“晋绥边区文艺界同志,互相勉励,在思想上,在文艺创作上,来一个彻底的转变”;二是自1937年7月7日卢沟桥事变爆发后,全民族抗战已进行了七个年头,“为纪念抗战七周年,为赞扬广大工农兵群众英勇战绩而创作”;三是为满足边区人民对文化生活的需求。

边区因广泛开展了减租减息运动,群众的各项生产活动开展得有声有色,生活日益改善,对文化教育的需求也越来越迫切。如山西岚县的群众,有的要跑到百里之外的赵家川口买书阅读;各地群众强烈要求看戏,有的剧团已经应接不暇、疲于应付;个别地方的群众为了让孩子读书,自己兴办学校,订阅报纸;有的自发成立剧团,等等。正如《抗战日报》发表的社论《“七七七”文艺奖金公布以后》一文所说:“从这些事,可以看见群众已经是在怎样普遍地急切要求着文化。今年,边区的生产更好了,到明年,群众的文化教育组织,群众的文化娱乐活动,一定会迅速广泛地开展起来,群众对文艺的需要,也一定更多和更加迫切。”

为开展好这次评选活动,发起单位成立了“七七七”文艺奖金评判委员会(以下简称“评委会”),并聘请林枫、吕正操、张平化、张稼夫、汪小川等十余人为评委会委员。

1944年2月25日,评委会发布了文艺奖评选办法,将文艺作品初步分为三类:第一类,小说(含报告文学、散文);第二类,剧本歌曲(包括话剧、梆子、郾郾戏、秧歌及新型歌剧);第三类,连环画、年画。各类分别设甲等奖1名,奖金3000元;乙等奖2名,奖金各2000元;丙等奖3名,奖金各1000元。评委会明确提出了创作要求——在内容上要围绕对敌斗争、减租生产、防奸自卫等抗日根据地的三大任务为总的方向;在题材上必须以工农兵为主要对象,贯彻1943年毛泽东同志在中共中央招待陕甘宁边区劳动英雄大会上所作的《组织起来》的讲话精神,并写出组织前和组织后的生活对比状况;在作品形式、语言、构图和音调上必须力求通俗易懂,能为工农兵群众所接受、传播。凡适合以上创作要求者,无论新作或旧作,一律欢迎,获奖作品按等级发放奖金,登报表扬,并取得作者同意后出版发行。评委会还规定了截稿时间和公布获奖名单的日期。

评选结果及作品述评

这次评选活动自征文启事发布后,各地非常重视,广泛发动,组织落实,应征者格外踊跃,纷纷投稿参评,评委会共征集到戏剧、散文、诗词、歌曲、图画等各类文艺作品123部。评委会先后两次召开评选会议,从政治内容、是否易于普及、创作技术水平三个方面进行评选。对于歌曲类作品,评委会专门邀请五位从事音乐工作的同志为评委,反复评议,再提交评委会最后裁定。在评选过程中,评委会发现应征的剧本类作品较多,且质量上乘,为不遗漏优秀作品,将剧本类作品的甲、乙、丙等次的评选篇目数量各扩大一倍;应征的歌曲类作品虽然较多,但水平一般,且差别不大,无特别优秀者,经慎重研究,决定选择六首较好者,不分等级,一律给予1000元的奖金;小说散文类作品因没有格外优秀的作品,甲等奖项空缺。

这次评选结果原定在“七七事变”爆发七周年纪念日公布,但由于种种原因,延期至1944年9月18日公布。当天的《抗战日报》头版头条位置上,刊登了消息《毛主席文艺方针下边区文艺的新收获——“七七七”文艺奖金获奖作品正式公



纪念抗战胜利80周年 抗战文艺回眸



郑学富

布》,公布了获奖作品名单,其中戏剧类作品12部,小说散文类作品5部,图画类作品6部,歌曲类作品6部。

这些获奖作品内容丰富,符合当时边区的政治任务,切合边区群众的实际生活,在形式上、技术上,大都能够普及,为群众所喜闻乐见,且多样化。如戏剧有话剧、山西梆子、郾郾戏、道情、秧歌及新型歌剧;小说散文类有小说、通俗故事、报告、速写和童话;图画有年画、连环画及木刻画;歌曲大部分也都符合当地的曲调风格和语言特色。

1945年5月6日,冯牧在《解放日报》发表文章《敌后文艺运动的新收获——读晋绥边区“七七七”文艺奖金获奖作品》,评价这些作品说:“语言的生动、自然、有地方色彩而不过于雕琢。这是一个很难得的优点。一般说来,利用地方语常常会因为对于当地人民生活了解得不深入而使得有些地方语汇成为一种奢侈,一种贴上去的文字上的装饰。而这些作品,包括这里未着重提及的,却很少给我们以这种感觉,虽则它们大都是用山西土话写成的。”

获甲等奖金的新型秧歌《大家好》,主题是描写抗日根据地军民如何紧密地团结在一起共同战斗、生产和生活的,剧本里包含很多话剧的成分,对生活细节的描绘生动且贴近现实。另一获甲等奖金的《王德锁减租》属郾郾戏。郾郾戏是一种地方戏,由陕西省郾县(今眉县)、郾县(今户县)的民歌小调发展而成,流行于陕西、山西、甘肃一带。《王德锁减租》主要是反映农会团结农民同地主作斗争,实现减租减息,发展生产的故事。冯牧指出:“作者为我们绘了一幅在减租运动中广大农民群众和顽固地主作斗争的鲜明图画,它不借助于任何抽象政治口号来说明主题的中心,而是通过了人物的形象来表现出当前的现实,通过了活生生的有性格的人物来说明减租运动的重要及其解决的道路。”该剧采用郾郾戏曲调,但是也吸收了其他剧种的音乐,因此对郾郾戏音乐有所改革和发展。

获小说散文类乙等奖金的《张初元的故事》,是马烽根据边区劳动模范张初元劳武结合的事迹创作的通俗故事。张初元是一个无地的农民,又是一个赤贫的煤矿工人,在旧社会受尽剥削与压迫。自从晋西北人民政权成立后,张初元积极投身革命,担任民兵分队长。1944年,张初元为了对付日军的“三光”政策,首创了民兵组织与变工组织结合起来的方法,平时民兵和群众一道生产,有了敌情马上参加战斗,使生产战斗两不误。劳武结合的做法,得到群众的热烈拥护,张初元被评为劳武结合模范。这一经验得到了党中央的充分肯定,很快在各根据地推广起来。

“七七七”文艺奖评选启示

“‘七七七’文艺奖金评选”活动是晋绥边区文艺运动中的一件盛事,正如《抗战日报》社论文章《“七七七”文艺奖金公布以后》所云,“是在毛主席的文艺方针下,我敌后文艺运动的一个很大的收获”,对转变边区文艺工作者的作风、促进边区文艺创作繁荣具有重大意义。“可以并不过誉地说:这些作品,不仅是晋绥边区文艺运动的重大收获,而且也是敌后根据地文艺运动极可珍贵的收获。这收获,不但是由于晋绥边区近年来贯彻了减租生产政策,人民生活日益提高,对文艺的需求逐渐迫切的结果,也是由于晋绥边区的文艺工作者很好地执行了毛主席所提出的‘为工农兵服务’的文艺政策的结果。”

1945年春天,获奖作品由吕梁文化教育出版社出版单行本。这些单行本到达陕甘宁边区后,《解放日报》还刊登了副刊部文艺编辑冯牧的文章予以介绍。

这次评选活动对文艺工作者有着深刻启示,他们认识到文艺工作者只要认真贯彻执行党的文艺路线、方针、政策,本着为工农兵服务的精神,就能创作出更优秀、更加普及的文艺

作品,来满足群众的需要。冯牧说:“在敌后根据地,生活虽然艰苦,环境虽然动荡,但只要我们能够正确地执行党的文艺政策,我们还是有可能创作出好的文艺作品来的。晋绥边区给我们提供了一个出色的例子。”“只要我们的文艺政策执行得正确,我们是可以期望从他们那里,从广大的根据地人民中间,产生出更成功的作品来的。”

文艺工作者们还意识到,边区的文艺创作应突破少数文艺工作者的狭小圈子,涌现出更多新的文艺工作者,特别是应该培养大批工农作者,创造条件让他们脱颖而出。一些工人、农民和军人,之前认为创作文艺作品是作家和专家的事,通过这次征文活动他们冲破日的桎梏和偏见,发挥其创作天赋,结果大放异彩。如《转移》的作者孟繁彬、《张初元的故事》的作者马烽,都仅仅上过小学,并未专门研究过文艺,却能把自己的战斗生活和模范人物有声有色地描绘出来。“不是专门从事文艺工作的同志们,只要他们有丰富的实际斗争生活,有一股文化水平的文字修养,他们就可能写出动人的真实的作品来,而且也只有有着丰富的实际生活的人,才可能写出成功的、动人而真实的作品来。”

这次评选活动也发现了一些文艺创作上的问题。如:现象罗列、不会剪裁、或只凭道听途说而主观臆测、闭门造车,致使内容空洞、虚假;对群众的口语不加选择、不够洗练,使群众的生动语言失去光彩,有的甚至东拼西凑、南腔北调,等等。这些问题的产生再一次证明深入实际、深入生活,向群众学习的重要性。

“只有真正手触生活,沉醉在工作里边,认真向群众学习,不要持旁观态度,不要浅尝辄止,只有这样,才会对自己周围的人和事物、语言了解深刻,在创作上才会有所成就。”《抗战日报》1944年发表的社论文章现在读来,依然堪称真知灼见、发人深省。

津门足迹——点亮天津的100个红色地标

“筑声剑影楼”里的家国情怀

——记北洋法政专门学堂遗址

白 琳

开启思想启蒙 生再建中国之志向

1907年9月,李大钊正式入读北洋法政专门学堂(1909年更名为北洋法政专门学校)。在校期间他精于学业,苦习英语、日语及政治、经济、法律等方面新知,如饥似渴地阅读钻研《社会契约论》《民约论》等民主法治相关名著,接受现代思想启蒙,逐步树立起反对封建专制、追求民主自由的世界观,“随政治知识之日进,而再建中国之志趣亦日益腾高”。

清末,国家支离破碎,百姓生活困苦,李大钊将自己的居所命名为“筑声剑影楼”,借荆阿与高渐离刺秦之举,立以身报国之志。他以诗抒怀,以文载道,“久居燕市伤屠狗,数覩郑商学贩牛”的苦闷与求索,“家困十年多隐恨,英雄千载几荒邱”的悲愤与无力,“国殇满地都堪哭,泪眼乾坤涕未收”的感怀与悲痛,都充分体现其为民族之辱而痛、为民族之困而愁、为民族解放而起的强烈情感。

与此同时,老师白毓昆对李大钊思想的成长起到了重要作用。白毓昆曾“以地理学救国”为志向,加入同盟会,走上宣扬民主、献身救国的革命道路,后受邀来天津任教,在三尺讲台上阐述革命救国理念。白毓昆对李大钊尤为器重,有意安排他参加一些时事讨论等进步活动,进一步提高了李大钊的思想觉悟。1912年初,白毓昆因组织领导滦州起义被捕,刑场上立而不跪,振臂高呼:“此身可裂,此膝不可屈!”其视死如归的气概和“为我主义而死”的品格使李大钊深受震撼,更加坚定了其挽救国家危亡的决心。

进行政治实践 寻救国救民之真理

李大钊在校学习时期,正值社会思潮空前激荡、革命浪潮风起云涌的辛亥革命前后,身处当时北方政治运动的中心——天津,他开始积极投身于探求救国救民真理的革命实践。

1910年12月,天津学生发起第四次立宪请愿活动,天津

2024年10月29日,时值李大钊诞辰135周年之际,位于天津市河北区志成道33号的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李大钊在津求学和开展革命活动遗址经精心修缮正式开放,以崭新之姿向世人诉说往昔峥嵘。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是中国近代史上第一所全日制官办政法专门大学,孕育了众多人才,也成为李大钊探求救国救民真理、踏上革命征程的光辉起点。

急思深研政理 择进津求学之道路

20世纪初,清政府为维系摇摇欲坠的政权,进行了包括废除科举制度的一系列改革,千年仕宦之道被迫谢幕。天津自1860年开埠之后,逐渐崛起为洋务运动在北方的核心要地,成为中国变革进程中的先锋。1901年,袁世凯积极推行“北洋新政”,“中国各省新政之布,必资模范于北洋”,“各省咸派员考察,藉为取法之资”。鉴于新政涵盖变法修律、政制革新等诸多方面,对新型政法人才的需求愈发迫切,袁世凯向清廷提出奏请,于1906年12月30日在天津海河北岸河北新区创办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学堂引入西方教育模式,传授“专门学术”,旨在培育“完全法政通才”,课程设置与师资配备均走在全国前列。“那时中国北部政治运动的中心,首推天津,天津以北洋法政学校为中心”,1923年李大钊在母校校庆纪念会上《十八年来之回顾》的演说,肯定了天津及北洋法政专门学堂的重要地位。

1907年夏,即将完成永平中学二年级学业的李大钊,站在青春的十字路口,是选择升入保定直隶高等学堂,还是追寻内心深处的鸿鹄之志?他经过思忖毅然选择了后者,踏上进津求学之路。当时,天津有北洋军医学校、长芦银行专修所和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三所学校正在招考,一心期望为国找寻出路的他“感于国势之危迫,急思深研政理,求得挽救民族、振奋国群之良策”,认为“军医非我所喜,银行亦违我素志,故皆决然弃之,而入法政”,遂考入北洋法政专门学堂。可以说,李大钊报考北洋法政专门学堂之举,绝非一时兴起之轻率决定,而是他深思熟虑后为探求救国救民真理所迈出的坚定步伐,对其后来的革命生涯产生了深远影响。

编者按

天津是一片具有光荣革命传统的热土,回望党在天津百年奋斗的光辉历程,渤海之滨、海河之畔,津沽大地留下了灿若星河的红色印记。为深入学习贯彻落实习近平总书记关于把红色资源利用好、把红色传统发扬好、把红色基因传承好的重要要求,加强天津红色文化研究,擦亮天津红色文化底色,本版推出“津门足迹——点亮天津的100个红色地标”系列文章,由市委党校精选100个革命旧址、纪念馆等体现天津红色文化特质的标志性符号,用红色资源讲述革命故事,挖掘蕴含的思想内涵和革命精神,传承红色基因,赓续红色血脉,凝聚奋进力量。



北洋法政专门学堂旧址